

資本與行動

生育決策的跨學科研究

Capital and Acti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ld-bearing Determination

庄渝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本與行動

生育決策的跨學科研究

Capital and Acti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ld-bearing Determination

庄渝霞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与行动:生育决策的跨学科研究/庄渝霞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733 - 0

I. 资... II. 庄... III. 生育—研究—中国 IV. 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7602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傅惟本

资本与行动

——生育决策的跨学科研究

庄渝霞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78,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733 - 0/C · 342

定价 30.00 元

序 言

早在 1884 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简练概括了“两种生产”的思想:“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两种再生产即是指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

1968 年后,罗马俱乐部曾探讨过世界人口、工业发展、粮食生产、资源消耗、污染的相互影响关系,指出“现今人口和资本增长的格局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继续按照现今这种格局增长的最后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衰退。”为了“免于污染和拥挤以及免受世界系统可能崩溃的威胁”,他们提出应该尽快降低出生率和控制资源的消耗,实现“全球的平衡状态”。([美]梅多斯(Meadows, D. H)等著,于树生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该报告虽然过于夸大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作用,但它表明了人口发展需考虑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协调。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学术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多次使用并明确定义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后,可持续发展思想更是深入人心。于是两种再生产理论逐渐过渡到三种再生产理论,即人口再生产需同物质资料再生产、生态环境再生产相适应。

21 世纪初的中国,在面临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资源消耗过多、环境继续恶化的同时,人口发展又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基数大而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化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人口变动这些子系统的一系列行为,对于资源与环境这些子系统的影响。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人口如何变动,才更有利于将发展困境风险降至最小,促

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显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目前拥有 13 亿多总人口、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又处于很低生育率的大国来讲,全面深入研究人们的生育决策观念和行为无疑有利于在稳定低生育水平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适时并逐步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我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不同意当前国内外一部分人口学者提出的中国只有立即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才能尽快促使生育水平回升的观点,认为“要真正实现中国生育水平的适度回升,需要在生育观念上与时俱进,确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上与时俱进,使政策导向有利于广大城乡育龄夫妇按法律法规生育;在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上与时俱进,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出发择时加大‘微调’力度,再发展到全国普遍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桂世勋,《实现我国生育水平的适度回升需要“三管齐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庄渝霞博士在本书中则立足于当前宏观社会背景,运用资本这一分析工具,从家庭、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对生育决策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跨学科研究:

一是从女性学学科的视角,从性别关系入手来说明两性地位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正如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所说的:“从事智力活动的妇女,通常不愿因神赐而生很多子女,以致她一生中最宝贵的部分为妊娠、哺乳及育婴所耗费”(德·奥古斯特·倍倍尔著,葛斯、朱霞译:《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无疑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增强了她们在生育决策上的权利。

二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趋同这一心理现象来说明生育决策的非理性。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跟风”的生育心理,人们往往跟随大多数人的生育决策和行为。一旦某个社会少育蔚然成风,其他个体就会较多采取少育的行为。一旦某个社会大力倡导“英雄母亲”,人们也会坦然接受多育的行为。本书在阐述心理趋同的这一非理性行为时,却采取了理性的分析方法,从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地位和个人资本等方面寻找现实的依据,不失为一种科学的论证和研究方法。

三是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家庭生育决策与国家人口目标的不一致,即理性缺失进行分析。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经济政策措施对于控制或鼓励人们生育是常用的手段,而本书从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生育产权界定和生育许可制度等进行分析,拓宽了我们看待控制生育行为的思路。

总之,本书从女性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生育决策的全过程,不仅具有深化过去往往从单一学科进行生育决策研究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利于决策部门在制定和完善影响生育的配套政策措施时,从主要关注经济利益的导向作用,转向同时兼顾两性关系、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

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解决人口问题时须更慎重、更周全。两性关系是相互依赖的,我们要高度重视女性的解放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效应,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男性的健康长寿对于促进两性和谐的意义。1995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曾指出:“关注和推进妇女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绝不仅仅是妇女的事情,而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认识应当上升到这一高度:争取男女平等的重要性不亚于废除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消亡。”这要求决策者要更多地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看待社会问题。现今,构建覆盖中国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已在全力实施,将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有机结合起来,重建老少共乐的孝道文化,呈现生机勃勃的社会景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不应该忽视的。经济,固然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带有基础性的物质条件,但重视建设无性别偏好的、按法律法规生育的现代生育文化也是十分重要的,未来中国生育水平的适度回升、出生性别比的平衡、两性婚姻的美满以及老少关系的其乐融融,都需要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创新。

桂世勋

2009年7月于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前言.....	1
一、研究议题的提出	2
二、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3
三、问题研究的背景	5
四、问题研究的意义	7
五、理论框架的八要素	9
六、结构及解释框架	13
第二章 研究综述	18
第一节 西方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18
一、经济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18
二、社会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26
三、社会心理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29
第二节 国内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32
一、经济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32
二、社会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39
三、社会心理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45
第三节 生育决策理论评价	47

第三章 理解社会行动——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与方法	52
第一节 社会行动	52
一、要素之一——知识	53
二、要素之二——互动	56
三、要素之三——理解	60
第二节 理解社会行动的学科演进	62
一、分化期	63
二、渗透期	66
三、融合期	75
第三节 理解社会行动的两大关系辨析	77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	
——理解社会行动的分歧点之一	77
二、理性与非理性	
——理解社会行动的分歧点之二	84
第四节 资本——理解社会行动的分析工具	93
一、资本观的演进	93
二、资本观在生育行动中的应用	100
 第四章 生育决策权力抗衡——家庭层面的分析	107
第一节 研究综述及建构	107
一、关于权力的论述	107
二、资本、地位、权力、性别关系建构	109
第二节 中国生育权力抗衡的焦点——家庭生育决策	113
一、生育权力抗衡回顾及演进	113
二、家庭生育决策多样化分析	119
第三节 家庭生育决策的根源分析	124
一、首层根源	124
二、终极根源	128
三、结论	144

第五章 生育决策趋同行为——群体层面的分析	146
第一节 模仿行为研究的简要回顾	146
一、模仿行为研究	146
二、社会群体与趋同行为关系的初步研究	151
三、评论	152
第二节 生育趋同行为理论建构	153
一、生育趋同的特点	153
二、生育趋同的类型	160
三、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的影响因素	171
四、生育数量趋同的解释框架及其假设	182
第三节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的实证分析	183
一、研究资料来源及基本情况	183
二、变量测量及处理	184
三、模型估计及模型解释	189
四、结论	194
第六章 生育决策理性缺失——社会层面的分析	196
第一节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关系	196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关系概述	196
二、个体生育与集体生育关系辨析	199
三、生育决策理性缺失的提出	200
第二节 生育决策理性缺失的根源	201
一、理性缺失的根源	201
二、生育决策理性缺失的成因	206
第三节 弥合生育决策理性缺失的途径分析	226
一、资源产权界定	226
二、生育产权	231
三、生育许可证制度	236
四、结论	239

结束语.....	242
参考文献.....	247
后记.....	261

第一章 前 言

人是地球上最具创造力的生灵,展现了地球上生命体最美妙的风景线,但人的生存并不是唯一的,它历经与万物一块进化的过程,并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的主宰,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样,人也不是单一的,它历经着自身再生产的过程,从而世代繁衍生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2)}即,是生育,延续了人类,维系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生育逐渐摆脱原始氏族、部落共有的状态。随着私有财产制的确立,生育便成为一家之事,生育的决策和实施必须在家庭内完成。但焉知,一个个家庭的生育决策和行为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当人类意识到人口剧增超过社会所需人口而产生负面影响时,便采取了对家庭实行计划生育的做法。因此,在家庭范围内存续的生育便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生育,不仅是一家之事,它连结着家庭与社会,是家庭与社会为之共同承担责任的对象。

一直以来,人口问题、生育决策是争议最热烈的问题。贝克尔将经济学引入了家庭和生育的研究领域,虽然从学科意义上来讲是一次经济学向社会学的空前进军,但事实上仍无法解释生育决策的本源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和文化惰性都成为众说生育决策问题时常提及的字眼。殊不知,虽然生育仅涉及每个家庭,但其累积效应将决定人口数是与社会生育目标相一致或相背离。因此,这些老生常谈的事宜都无法找出家庭生育决策与社会生育目标相违的焦点处。由于生育决策既关系到人们的基本权利,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因此,只有找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及与理性人口目标相违的焦点所在,才能真正消除家庭与国家在生育问题上的不和谐之音。

一、研究议题的提出

2004年,上海市政府对1990年8月11日发布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改,颁布了新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取消生育间隔,取消了对没有生育夫妇的奖励,放宽了生育二胎的主体和条件。于是,2008年10月29日《新民晚报》社区版家庭周刊第一版报道了凌小姐一家关于生育决策的事宜,题目很醒目:“白领生二胎,当梦想成为可能。”^[2]凌小姐无奈地将其称为一场战争,“生第一个孩子,是一种甜蜜;生第二个孩子,是一场战争”^[2]。为什么称为一场战争呢,因为男方和男方父母都坚决赞成要第二个孩子,而女方凌小姐则考虑到自己事业刚刚起步,再次怀孕势必影响工作,女方父母也因为心疼女儿有点迟疑。但是,办公室的姐妹都赞成凌小姐生第二个孩子,而且凌小姐的好朋友周小姐生了两个孩子后,也觉得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有责任感和互相照应。所以,虽然凌小姐知道生育第二个孩子主要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养不养得起的问题,最终还是决定生育第二个孩子,于是迅速改变了家庭的财务计划。一是家庭生活质量迅速下降,除了儿子之外,她和老公一整年不再买衣服;二是每月存2000元,计划10年共20多万元,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三是甚至通过双方父母的帮助来共同养育第二个孩子。

生育决策看似一个简单的个人选择的过程,但认真分析,生育决策是一个经济、社会和心理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行动。生育决策涉及方方面面:一是性别关系,二是外界压力,三是经济预算。具体而言,一是女方和女方家庭在生育决策中是否与男方和男方家庭一样具有同等权利,事实上决策的过程表明了父权制权威的事实;二是生育决策存在茫然的趋同,受到他人的说动,或者看到他人采取生育两个孩子的行动,也做出同样的选择;三是生育决策与经济承受能力的相关度,两位白领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采取啃老的方式来多育一个子女,这种行动的背后动力是什么?

生育决策看似事小,但从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来看,不可等闲视之。因此,有必要研究生育决策的根源是什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新的时期,女性面对生育决策还有多少权利?两性关系、家庭结构对于生育决策存在何种影响?其次,地球资源和经济水平能否承担更多的人口,人们的选择是理性还是盲从?人们生育决策心理过程受哪些因素影响?再次,经济的制约在当今阶段真的起作用吗?生育决策更多的是文化因素还是经济因素?

二、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生育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太多或太少的人口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不利于人们安居乐业并自由地栖息在这个地球上。在人口与生育方面,人们往往陷入一个悖论的局面,即每个家庭追求理想生育数的举措,结果却使宏观人口规模偏离适量人口的目标,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只有揭示生育决策的内在过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解决家庭生育需求与社会人口需求的矛盾。关于生育或人口的探讨虽延续了几千年,但至今还没有最明确和最圆满的解释。

以下,是中国在人口和生育上所存在的问题:

1. 人口数量众多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首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净增人口呈逐年减少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但人口总数仍是惯性增长。这一惯性增长将使中国人口在四五十年后直逼最大可容人口 16 亿的界线。每个家庭对于孩子数量的需求或许是合理的,但从国家发展角度而言,却造成了非理性的代价。如此,面对如今已超过 13 亿人口且面临新一轮生育高峰的到来,以及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微调的关键时期(绝大部分地区都规定了若双方是独生子女时,可以间隔几年生育第二个孩子),更有不少学者倡议放开二胎生育,那么中国将采取何种生育政策才能使人口结构朝着更理性的方向发展呢?不少学者提倡通过调节人口数量来改善人口结构,那么到底是人口数量还是人口结构在抑制中国发展的脚步?两者相权取其轻,控制人口数量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并不是说,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不重要,而是可以通过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以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

2.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决策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也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个孩子。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由各自自治区或所在省决定。

在上述基本政策指导下,各地人大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了计划生育条例,确定了当地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全国除 6 个省区和

西藏农村基本实行生育两个或多个孩子的政策外,有7个省、市规定一般情况下只生育一个孩子;17个省区规定农村人口一对夫妇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有实际生活困难的,可以间隔几年后,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3]但是,绝大部分地区都规定了若双方是独生子女时,可以间隔几年生育第二个孩子。

为什么在大多数省份农村必须实行“一胎半政策”,即第一胎是男孩不能再生育,若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在间隔四年后再申请生育二胎?在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民具有一定约束力和权威性的条件下,不少第一胎生了男孩的家庭就主动保持一胎的生育数量底线,而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却很少放弃申请再生育二胎的权利,其根源显然在于男孩偏好。但事实上,“一胎半”政策虽然解决了部分人口偏好男孩的愿望,仍有一部分家庭偏好男孩的愿望难以实现。男孩偏好无形中使出生性别比偏高和生育数量扩张。甚至,虽然一些家庭偏好男孩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生育数量偏好却无法实现。不少家庭在生育政策挤压下而无法满足其生育意愿时,寻求一切途径来满足其愿望。结果,每个家庭生育数量的增多,其社会累积后果却是可怕的,使人口总数量远超过适量人口数。

偏好男孩的根源在于哪里?女性和男性在生育动机和决策上的关系到底如何?流动人口的出现以及流动人口生育态度的转变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原来,生育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此,生育决策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得找出影响生育决策的根源。

3. 经济对于生育决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口众多的困境,出于延续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早期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无视计划生育的超生现象以及“黑户”人口的存在。因此,政府又通过采取经济手段以期调节人们的生育数量,引导家庭生育走向社会所需的“合理性”生育。但事实上,经济手段的采取,如罚款,对于生育的制约力相当弱,特别是对农村生育的管理难度最大。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对策,但仍然无法消除人们在“生育”上偏好更多孩子或男孩的这一症结,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似乎在此并不像想象中那般起作用。经济确实发展了,但经济对于人们生育行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仅依靠经济调节的手段未必能改变目前生育上存在的数量和性别偏好的事实。如此,我们得思考影响人们进行生育决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经济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既然每个家庭的生育决策和行为具有人口数量累积效应,而在人口数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因素的事实面前,揭示家庭生育决策的真正根源,从而引导人们从“不合理”(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的生育选择走向合理的生育选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固然,生育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劳动力,但在人口数量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重负时,过量生育将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因此,寻找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并积极干预和引导背离理性的社会人口目标的家庭生育决策和行为,仍是当今中国需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

三、问题研究的背景

对于“生育决策的跨学科研究”这一选题和定题,不是一种盲目的选择,某一研究至少得对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起到警醒或启迪作用,才有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生育决策的跨学科研究”的选题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困扰着政府、人口学家及社会学家的一个相当关键的热点问题。

1. 可持续发展的倡导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想主流,可持续发展涉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几大关系中,人口问题是重中之重。

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中,就指出:“明确地将人口因素纳入经济和发展的战略不但可以加速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和减轻贫困,而且还可以有助于实现各项人口的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4]可持续发展虽然是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出发的,由于发达国家毕竟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阶段,它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而做出努力,而发展中国家毕竟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目前更多地是为人口的迅猛增长而忧虑。

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因子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但人口因子具有特殊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口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我们对于人口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94年,彭珮云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表彰大会上指出:“从我国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对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还包括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问题。

我们不仅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把人口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促进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还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改善人口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5]

可以说,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人口再生产类型向更合理化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社会再生产、资源和环境再生产相一致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兴起,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人口问题,研究生育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协调发展。

2. 性别平等的推进

从19世纪初至今,西方已兴起了三次女权运动,女性理论研究也从参政、教育、就业权等一般层面转向更为广泛、更为具体的层面,如生育自由、性爱、暴力、女性与生态、女性与文化等领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较大程度上对于性别平等的关注,特别是对女性生存的实践和运动的关注,推进了男女平等的进一步深入。

事实上,性别歧视在全世界仍然十分普遍,美国学者切芙茨(Chafetz)列举了美国女性受歧视的状况:女性拥有很少的物质用品和服务设施;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女性较少拥有公共的或人际关系的决策能力;女性较少获得威望的角色;女性较少获得富裕和满足的机会;女性较少有正式的权力;女性较少拥有丰厚的资金和财产。从世界范围看,男女不平等具有普遍性(Sarris, 1985; Sirard, 1985; Tiano, 1987)。^{[6](20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发达国家女性地位与男性相比仍存在相当差距,发展中国家女性状况更差。虽然社会在进步,但社会发展的新技术使女性地位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比如,有些国家政府(中非)只规定农业机械和训练仅向男性开放,导致女性技能不足,报酬降低;有些国家女性作为新娘的价值只存在于她结婚时有多少嫁妆(这种情况在印度相当普遍,而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存在这种陋习)。

可喜的是,西方男女平等运动的推进,也促进了中国男女平等进程的发展和深化。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促使了一批女性理论研究者的觉醒。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中国在近二十年也兴起女性研究的热潮,在各种学术报刊、书籍中出现了大量对女性地位的研究。研究推进了政策制定者具备一定的性别视角,从而维护女性的利益和促进女性发展。

在此宏观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深思作为生育的载体——女性在生育时所做出的决策与男女平等的关系。纵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女性地位与生育现象,我

们不难发现在女性地位较高的国家,女性生育的自主权较强,生育数量较少,性别偏好较弱;在女性地位较低的国家,女性生育的自主权较弱,生育数量偏多,性别偏好较严重(当然,在计划生育政策约束条件下的生育选择另当别论)。生育事关国家人口发展大局,只要女性无法平等地与男性享有生育的决策权,人口发展必然会出现某种偏差,比如多育、性别偏好,最终带来诸如低成本抚养、出生性别比偏高、婚配难等社会问题。因此,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只有消除性别歧视与偏见,提高女性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深入发展,才能消除人们在生育上存在的偏见,才能使家庭做出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育决策。

四、问题研究的意义

1. 凸显了两性关系对于生育决策的影响

生育是一种微观决策,同时又是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反映,因此,基于宏观背景来分析微观决策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看到生育的真实面目。由于人口太多,不但制约个体的发展,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因此,针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改变影响因素的权重,有利于微观主体决策行为的改变。在以往关于生育的研究中,虽然注意到女性地位对于家庭生育决策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分析生育决策时,仍然把夫妻当作微观主体的共同体,忽略了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微观)是社会关系(宏观)的反映。夫妻之间是对抗性决策或一致性决策,即家庭两性的权力关系,对生育决策属于何种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欲从微观主体——夫妻生育决策中的权力关系入手,来探寻生育决策的真实面貌,说明女性地位对生育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2. 有利于认识生育上的群体趋同心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朱迪·罗丹(Judith Rodin)曾指出:“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上。在这个时代中,现代社会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由行为问题造成的。”^[7]她列举了诸如能源的使用、城市人口拥挤、贫穷和犯罪等许多行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类行为科学的研究,并且必须与政府的决策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然,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是以“理论中心”为基本立足点的,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应用心理学就应运而生,它所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不但研究个体、群体行为,而且对政府行为水平进行研究。它把个体、群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研究政府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心理问题的重要性。